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

梁景和 主编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

塑造顺民

——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

Shaping the Docile Subj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by Japanese Puppet Regime in
the Occupied North China

黄东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

梁景和 主编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

塑造顺民

——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

Shaping the Docile Subj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by Japanese Puppet Regime in
the Occupied North China

黄东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 / 黄东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

ISBN 978 - 7 - 5097 - 4371 - 3

I. ①塑… II. ①黄… III. ①日本 - 侵华 - 文化侵略 - 史料 - 华北地区
②日本 - 侵华 - 教育侵略 - 史料 - 华北地区 IV. ①K265. 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1265 号

·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 ·

塑造顺民

——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

著 者 / 黄 东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范明礼 许 力

电子信箱 / renwen@ ssap. cn

责任校对 / 曹艳浏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张晓莉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6.5

版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字 数 / 285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371 - 3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 委 会

顾 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志琴 李文海 耿云志 戴 逸

学术委员会主任

郑师渠

学术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左玉河 朱汉国 孙燕京 闵 杰 李长莉 余华林
迟云飞 杨念群 杨才林 夏明方 徐永志 郭双林
梁景和 黄兴涛 黄 东 魏光奇

主 编

梁景和

总序

梁景和

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后，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发生了重大变革，学术界迎来崭新的繁荣时期。中国近现代史与其他史学专业也都有了长足发展。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犹如本专业的其他领域，亦展现着自己特有的新生魅力。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化史的复兴，80年代中期社会史的复兴，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文化史的兴起，这三条线索所铸成的链环与其他领域紧密结合，呈现出中国近现代史的强劲发展势头。其中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走过自己20年的艰辛历程。

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学者提出文化史与社会史相互结合的问题。^①1990年有学者撰文，^②提出“社会文化史”的学科概念。1991年有学者在学术领域开始运用“社会文化史”^③的概念。1992年与2001年，在北京先后召开了“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和“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两次学术研讨会，^④会议集中探讨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问题。2005年、2007年和2009年分别在青岛、乌鲁木齐和贵阳召开了三次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

① 刘志琴（署名史薇）：《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②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参见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

③ 梁景和：《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关于社会文化史问题的讨论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梁景和于1994年在自己博士论文的提要中说明本论文的“社会文化史”的属性，认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范畴的一个具体领域”，参见《〈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提要》，1994，未刊稿。

④ 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科——“社会文化史研讨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讨会，会议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文化史论文发表，^① 也有关于探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文章。^② 2009年6月和10月，2010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三次“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③ 这也是开始以“社会文化”命名的学术会议。

20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征。

首先，社会文化史的本土性特征。中国社会文化史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改革开放的大势，催发了文化史的复兴，改革开放的深入，迎来了社会史的兴盛。文化史研究偏重于精神层面，即关注思想观念、社会意识等问题的研究。社会史研究偏重于社会层面，即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问题的研究。而社会文化史研究则关注两者的共生共荣。很多文化观念问题反映在社会生活等社会问题的层面上，很多社会问题与文化观念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社会文化史就应运而生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萌发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主要研究者是顺着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而走向社会文化史领域的。

其次，理论探索的自觉。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重视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在1992年“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和2002年“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有很多学者展开了讨论，并发表了很多重要的理论见解。^④ 此外，刘志琴的《青史有待垦天荒——试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⑤，梁景和的《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⑥ 和《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⑦，李长莉的《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⑧ 等都属于社

① 参见吕文浩《“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朱浒：《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毕苑：《第三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② 诸如梁景和的《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③ 参见《中国女性文化》第12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参见《社会生活探索》（第二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④ 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科——“社会文化史研讨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⑤ 参见《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⑥ 参见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⑦ 参见《河北学刊》2009年第3期。

⑧ 参见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

会文化史探索的理论文章。

最后, 展现出重要的研究成果。20 年来, 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① 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 诸如刘志琴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梁景和的《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2009, 修订本) 和《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0), 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从传统到现代》(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王笛的《街头文化: 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严昌洪的《20 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 2007), 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 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 修订版), 孙燕京的《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余华林的《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9) 等, 均为重要的学术著作。^②

社会文化史发展至今, 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 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 相关历史资料数量庞大, 但非常分散、芜杂、缺乏整理。相当多的研究者尚缺乏运用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的自觉性和经验积累, 缺乏研究范式上的建树。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 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知识训练等等。^③ 这些都是具体的实际问题, 需

① 关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文请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 左玉河、李文平:《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评述》,《教学与研究》2005 年第 3 期; 苏全有等:《近十年来的中国近代风俗史研究综述》,《安阳大学学报》2004 年第 2 期; 黄延敏:《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近代中国与文物》2009 年第 2 期等文的介绍。

② 重要的社会文化史学术著作还很多, 诸如严昌洪的《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 1991) 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李少兵的《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方平的《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德] 罗梅君的《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 19 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王燕生等译, 中华书局, 2001), 薛君度、刘志琴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等等, 此不赘述。

③ 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 参见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

要学者们一点一滴地处理和一步一步地渐次解决。

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 20 年的历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盼望早日迎来社会文化史发展的新时期。2010 年 5 月出版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① 和同期召开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走向座谈会”^②，以及《光明日报》2010 年 8 月 17 日刊发的《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一文，既是对以往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总结，也是对社会文化史未来发展的一个期待。2010 年 9 月 25 日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希望此次会议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我们坚信，以上面几项学术事项为契机，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将会迎来崭新的发展。

社会文化史兴起之初就引起了诸多年轻学者的兴趣，如今则吸引着众多青年学者的关注并把社会文化史作为自己的学术向往和学术追求。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准备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出版论丛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热心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部分青年的研究论著发表出来，以促进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现在本论丛已经正式启动，希望其中能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问世。

2010 年 7 月 20 日于幽乔书屋

①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② 毕苑：《“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回顾与走向”座谈会综述》，参见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第二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目 录

绪 论	1
一 研究动机与论题旨趣	1
二 学术史回顾	8
三 资料和使用说明	27
四 研究的对象、概念与逻辑	29
五 研究架构说明	39
第一章 传媒、教育：思想战的武器	40
第一节 掌控传媒与操纵舆论	40
一 对平面媒体的控制	41
二 控制电影及其他	55
三 实际宣传中对传媒的利用	64
第二节 选择知识与控制教育	69
一 学校教育的控制	72
二 社会教育的控制	78
本章小结	85
第二章 传统的“发明”：王道政治的追求	87
第一节 王道天下：新民主义的价值	90
第二节 寻求秩序：儒教的复兴	104
第三节 神道设教：信仰的利用	114
本章小结	131

第三章 黄种人同盟：“大亚洲主义”的号召	132
第一节 东亚新秩序：“共荣”与“联盟”	134
一 从“建设东亚新秩序”到“大东亚共荣圈”	135
二 东亚联盟论	136
第二节 友邦与解放者：日本形象建构	140
一 做为历史记忆的日本形象	141
二 新的国家形象建构	150
第三节 “同文同种”：亚洲主义下的种族联盟	162
一 “同文同种”论的背景	162
二 尴尬的宣传	167
本章小结	172
第四章 敌人的价值：腐朽党国、“赤祸”与侵略者	174
第一节 腐朽颓废与“华北之癌”：国、共形象的塑造	175
一 “腐朽颓废”的国民党政权	176
二 “赤祸”与“华北之癌”	183
三 “国共相克”	194
第二节 “东亚侵略者”：英、美形象的塑造	198
一 既存的英美形象	199
二 “击灭英美”的建构	201
本章小结	208
结语：建构中国的战争	209
参考文献	231
后 记	248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穆旦：《冥想》

绪 论

一 研究动机与论题旨趣

“自从此次中日战争，不独物资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内地情形怎样，我不深悉。但在沦陷区中，我觉得大众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大家不知道有国家、有社会、有朋友，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明日，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理想，只知道有享乐。”^① 1945年11月，陈公博在狱中写下这段自白，字里行间不见其成为汉奸的负罪感，也不见其对现世之留恋，相反却是对于国家的悲情忧思、叹息流涕。意气风发的中共一大代表，纵横政坛的国民党大员，居于炭火之上的汪伪末代首脑，陈公博一生际遇之奇特、变化之丰富，让人咋舌，陈公博若在此时感叹世事无常，叹息造化弄人，那是容易理解的，但一位即将被处死的汉奸，却在最后时刻如此表现，他这种新亭垂泪的责任伦理又从何而来呢？

这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但一定是变化最奇最大的时代。像汪精卫、陈公博这一类人，无疑是时代精英人物，在这个转型时代，他们都不乏济世安民之志，但命运错进错出间，他们最终却走上背叛国家之路。我们不禁要问，除了现实利益之外，是怎样的思想因素推动或者主导了他们的叛国？他们与传统的贰臣差别何在？他们企图建立起怎样的国家？对

① 陈公博：《自白书》（《八年来的回忆》），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39页。

于现代中国而言，伪政权又意味着什么？这些疑问促成了本书的写作，它旨在探求抗战时期的一个伪政权——华北伪政权是如何构建其“国家认同”的。

“汉奸”一词，最早可能见于元代胡震所著《周易衍义》，所谓“李固欲去汉奸而反遭群小之毒吝也，然志在去奸，于义何咎？”此处所讲的“汉奸”是指汉朝的奸贼。^①“汉奸”指称汉人之奸宄之说最晚见于明末。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给崇祯皇帝上疏，谈及西南水西土司叛乱的善后问题，提及“前件看得暇荒万里，未沾圣化，易动难静，自其恒态。而又有汉奸拨之，则鹿豕突，便为难端”^②。从民族大义角度进行定义，认为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③。这是现代国家出现后的产物，此处汉奸与蒙奸、回奸一般，成为对背叛中国之人的通称。

汉奸的产生，尽管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投敌原因，但概括而言，无非分为物质利益、政治企图、思想因素和情感等几个方面。^④

① 胡震：《周易衍义》，详见王柯《“汉奸”：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

② 杨嗣昌：《酌采水西善后疏》，详见吴密《“汉奸”考辨》，《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又，《汉语大辞典》记载，“汉奸”最早见于宋人王明清的《玉照新志》，“（秦）桧既陷此，无以自存，乃日侍于汉奸戚悟室之门”。据王柯考订《玉照新志》相关版本，并无相关记载。因《汉语大辞典》的撰写者并没有说明其所见之版本，其是否在王柯所考订范围之内不可知，因此“汉奸”最早见于何书，姑且存疑。惟此种从“汉人之奸人”角度来说明“汉奸”的说法并不罕见，在中国所有古籍尤其是方志之类尚不曾数字化之前，很难明确判断此种词意最早见于何书，但不晚于某书的论断却是可以做出的，这里笔者赞同吴密此种谨慎的说法。

③ 《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第886页。

④ 最早关于汉奸产生原因的分析出现在抗战之中，其中代表者为傅于琛所著《汉奸的产生与扑灭》（上海杂志公司，1937）。近年相关研究参见：益井康一《汉奸裁判史》（东京：みすず书房，1977）；马场毅《山东省の傀儡軍について》[アジア太平洋研究センター编《社会科学討究》第39卷3号（1994年3月），第843-872页]；罗久蓉《历史情景与抗战时期“汉奸”的形成——以1941年郑州维持会为主要案例的探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1995年6月）；孙玲玲、梁星亮《抗战时期汉奸伪军集团形成的社会因素探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刘杰《汉奸裁判：对日协力者を襲った命运》（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0）；刘照明《伪军：强权角逐下的卒子（1937-1949）》（香港：稻香出版社，2002）之绪论和第二章；付启元《抗战时期汉奸形成原因探析》（《民国档案》2002年第6期）；王侃《抗战时期附敌各阶层分析与国共两党的肃奸政策》（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何德挺《抗战时期汉奸心理之探析》（《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赵华《抗日根据地汉奸的类型及成因简析——兼论抗战时期日寇的内奸政策》（《兰州学刊》2007年第1期）；伍小涛《乱世潜流：抗战时期部分知识分子走上汉奸之路探析》（《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对于汉奸产生的原因，王侃依据汉奸的不同阶层做了较为详细的统计，赵华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分析，伍小涛则注重从近代知识分子的漂移性来分析。另外，对于惩治汉奸的相关研究综述可参见潘敏《20世纪80年代以来惩治汉奸研究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

从物质利益方面看，汉奸之投敌或是出于乱世之下的生活所迫，或是出于按捺不住诱惑，企图应时趁会大发其财。因生活艰难而被日本人收买成为汉奸，这在当时是屡见不鲜的。比如，张发奎曾经看到相关审讯汉奸的材料，发现一个汉奸组织其发展手法就是用大汉奸收买小汉奸，就好像包工头去招聘工人，被收买的这些人中不乏为了3元钱而去做汉奸的，其中甚至有12、13岁的女孩子为了5角或1元的报酬而加入这一队伍。^①

从政治企图方面看，通常来讲，小奸之投敌在于愚，大奸之投敌在于误。小汉奸之投敌多半是基于金钱等利益，1元、3元就可以去为日本人办事。大汉奸则不然，其投敌一方面在于对现有政权不满——这种不满不单纯是自己被冷落，也有对现政权的政策不认同，鄙夷、轻视执政阶层的道德、才具等等因素。另外在于对形势的误判：其一认为中国不能战胜日本，日本没有亡我之心；其二认为德、日轴心国在世界战场也将占据上风，并取得最终胜利，如此与其大局已定再投靠，不如看清形势便早投靠。这就是汉奸投敌的政治原因。这方面的代表最为显著者莫过于汪精卫。虽然汪精卫投敌有较复杂的原因，但是企图借与日本合作的机会，在日本胜利之后，以实现其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志向，成为新国民政府乃至战后中国的最高领袖，这种满足自身领袖欲的动机是一项重要原因却是毫无疑问的。其追随者在采取行动时也多半有形势误判的成分。周佛海就认为，抗战下去国家必然灭亡，所谓“战必大乱，和未必大乱”，所以他极力主张“和平运动”^②。至于汪伪政权建立后伪军数量的猛增，这也是与当时军头们的政治判断息息相关的。蒋介石对非嫡系的打压，以及对投敌者缺少惩罚，甚至为着战后的考量一定程度上还有意放纵，汪精卫“曲线救国”理论的影响以及轴心国对汪伪政权的承认，导致一些军人有了首鼠两端的心理支持，投敌于其自身而言就是脚踏两只船。典型代表如庞炳勋，他一方面欣然投入汪伪怀抱，一方面又以勾践、关羽自况，言辞凿凿地通告全国，说“勾践臣妾于吴，关羽屈身曹氏，终成其沼吴扶汉之功，勋之与敌虚与委蛇者，正欲保留国家元气，拯救罹难袍泽，防堵赤焰弥漫，稍抒党国北顾之忧耳”^③。

① 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编著《国共抗战大肃奸》，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第52-53页。

②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1939年7月22-24日），见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5页。

③ 社论《彻底肃清汉奸！》，《新华日报》（重庆）1945年9月6日第2版。

从思想因素方面看，汉奸之投敌还存在两种常见原因：

首先是“民族国家”观念的缺失。当时的一般民众多不能理解日本入侵与之前蒙古灭宋、清朝灭明有什么差异。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日本入侵中国是在做着王朝更迭的迷梦，他说，“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①。但历史事实是如此复杂，绝非简单的以没有现实价值就可以定论，因为彼时确实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并没有现代国家观念，只要事不关己，那么对日本入侵就并非感到如何痛切。有些人是将其当成了王朝更迭，比如山西的一些乡民说：“日本人厉害就让他来吧！那（哪）个皇上坐起，我们都要纳粮，是一样的。……而且卢沟桥听说发现一块碑，碑上写着日本该来的。还有推背图上也画着日本旗的。”^②一些人明知是侵略，却还存有功利主义的态度。譬如在淞沪抗战时期，当地的百姓对日本的密探说，“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③。因为要吃饭，自然被日本人用钱收买也就无所谓。

其次是对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正当性的质疑，以及对其民族国家建构路径的否定。换言之，国家认同的不同，减少了这些汉奸投敌时的心理障碍——他们本来就不认可所谓“南京国民政府”，那么对他们而言，投敌也并非是“叛国”了。这其中又可分为两类情形：汉奸之中一类是逊清遗老，这些人以民国为敌国，日本的进攻于他们而言不是入侵，而是天降时机，此时不应时趁势更有何待？比如郑孝胥，不仅不做民国之官，连民国年号也一并不用，所以当他与土肥原等人勾结之时，他显然认为自己是“复国”。汉奸之中另一类是北洋旧人，随着北伐成功，北洋政府已成为历史陈迹。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亦是近百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由帝治向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一个重要表征，可谓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千年未有之变局’”^④。从北洋时期的军阀官僚威权政治转为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党国威权政治，可谓二十年一大变局。因此种政治变动而被历史的轮盘甩出局

①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405页。

② 马志远：《抗日笑谈录》，共青团山西省祁县印，第1页。转引自魏宏运《抗战第一年的华北农民》，《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第150页。

③ 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编著《国共抗战大肃奸》，第58页。

④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180页。

外，并遭受利益之损失者，在感情上天然缅怀昔日五色旗主导的政权，这些人对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多少向心力。此类人不在少数，以华北伪政权而言，据汪朝光的统计，在整个政权存在时期，历任委员长、总长、督办和各省省长共23人，其中19人出身于北洋，约占83%。^①又据对伪政权治下之河北省各县知事的统计，截至1940年3月底，在沦陷各县日军选定的126名县知事中，出身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国会议员或省县议会议员、文武官吏有99人，占被统计人数的79%。^②而且，华北北洋旧人在投敌建政之时，北洋时期的所谓“宪政”仍是其宣示的旗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成立宣言中就明确宣告要讨伐国民党之党治，其政权组织中的委员会制也昭告大众意在民主制衡，与国民党政权判然有别。

除了上述几个因素，对日本的好感也是投敌的心理诱因之一。甲午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后，中国人掀起留学日本的热潮，在这批被称为“镀银的一代”的留学生中，有不少人视日中亲善为理所当然，因此当日本入侵之时，亲日情结使得一些人或多或少都会积极地从事所谓的“维持”事业，颀颜而行，不知羞耻，即使虽曰被迫，无非半推半就。据统计，在伪满、华北、华中、汪伪四家伪政权144名高级官员中，就学缘而言，曾留学日本者有54人，占到38%。^③另外，就华北的汉奸产生而言，南北新旧的情绪也须注意，北洋旧派的北方人另有一种渴望摆脱南方党人政府压迫以扬眉吐气的情绪。在中国，南人与北人之分早就有之，加上民国军阀混战，其大体格局，起先是北洋与西南之抗衡，继而是北洋与党军之颉颃，这都加重了地域间的对抗意识，并慢慢产生“南新北旧”的概念，“南北地域之分既与民初盛行的尊西崇新的大趋势相结合，双方的意识标帜也就渐与各自的地缘意识等同起来”^④。南方人认为北方人守旧怯懦，北方人认为南方人虚伪欺诈。尤其是在国民政府北伐过程中，很多北方人对其意义都不甚了然，对其张扬的“以主义统一”的大旗更是心中茫然兼生恐惧。当北伐成功，政治失势的北洋旧官僚目睹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更加产生出一种鄙夷情绪，认为彼等只是旗

① 汪朝光：《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

② 《日伪统治时期河北河南部分县知事名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案号：乙K10。转引自王士花《日伪时期华北农村的县级政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81页。

③ 汪朝光：《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

④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97页。

帜光鲜，实际无非仍是争权夺利。据李璜回忆，北伐之时，他就认为“更可忧者，是在精神方面，北人对于南人，在此次国民革命之后，怀着一种嫉视心理，革命既以主义相号召，而要称作‘北伐’，这是使北人感到南宋之对金人，把北人当作异族看待，何况更将北京改成‘北平’呢！”“乃知此一误解与怨言相当的普遍于北方社会”^①。当日军入侵，北洋旧人往往将南北对立情绪置于国家观念之上，并将投敌歪曲为向日“乞师”以光复“故国”。

现代国家之汉奸与传统王朝之汉奸区别而在？或言之，汪精卫之于秦桧，郑孝胥之于张邦昌，区别何在？窃以为，最大的差别便在于思想因素的不同，郑以民国为敌也好，汪否认蒋介石主导之国民政府也罢，支撑其行动之关键在于他们有一种别样的“国家认同”，不管这种“国家认同”如何荒谬，它都是进入现代社会才出现的，它不会出现在传统贰臣的思想之中。质言之，汪、郑是在民族国家体系的意识形态中寻求行为的正当性，秦、张则是企图在“中国一统天下”的体系中得到背叛君王的解释。当然，汪、郑还有其他汉奸们所建立的伪政权在意识形态上对传统资源都有所借用，比如天下主义，比如王道政治，它们与东亚联盟理论、中日协同理论等等构成新“国家认同”构建的理论基础，伪政权期待由此获得统治的正当性，企图赢得在其治下民众的认同，从而期望与南京国民政府争夺正统地位。

伪政权的出现与覆灭对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意义何在？在笔者看来，以前的种种轻蔑或者批判，尽管政治正确，却未免简单化了，窃以为，只有站在近代中国由天下至于国家的转型这样一个大时代来理解，方能体察其意义。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无疑是痛苦的。就好像一位老者在迈过一道高高的门槛，门槛那边是一个全新的天地，将给予这位耄耋老者新的生命伟力。然而跨越过程是如此缓慢而无助，原有的拐杖（社会结构）渐渐损毁，终至失去借助，老者的每一次提腿都充满痛苦与压力。^②更糟糕的是，这种跨越是别人催着、鞭打着进行的，不管多么不情愿，如果他还想存活就必须跨越。

所谓鞭打，最主要的表现当然就是战争。毫无疑问，学界几乎都认为现

①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第165-166页。转引自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15页。

② 这一比喻由美国政治学家勒纳“痛苦门槛理论”启发而来，参见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第15页。

代中国的形成在过程上大致是始于甲午战争终于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一役，是确立当下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现代国家认同的转换点。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看，战争是塑造现代国家最好的黏合剂，也是现代国家认同产生最好的培养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经抗战一役，一个现代的由中华民族构建起来的多民族国家得以最终定型，这是中国由天下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最后历程。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点上，“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就不单指军事上打败侵略者，更要在政治上打败侵略者，尤其是要在国家建构的路径上、国家观念上、国家认同上打败侵略者，这是一场思想战和文化战。因此，站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角度来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日伪政权的斗争实际上更是一场思想与文化之争，这种交锋的根本意义在于，当国家面临转型，中国的政治力量如何看待如何利用传统的政治文化资源、西来的民族国家理念、“大亚洲主义”等等区域结盟理论，并最终以何种意识形态取得胜利，且以此来塑造一个新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抗战时期，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复杂而艰难，伪政权们的国家理念是作为竞争的一方而存在的。站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角度，伪政权的国家建构的主张、努力与企图本身就是20世纪中国的混乱民族主义演进的一个面向，与“满洲国”寻求皇道、汪伪“南京国民政府”依循党治不同，华北伪政权（前期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期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更多秉承传统政治，其以新民而寻王道的国家建构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上有着别样的反思价值。这大抵是笔者对其进行研究的最大兴趣所在。仔细去分析他们的主张，就可以看到“那些无根无依的政权，和浮萍一般漂浮了几年的政权，投入了‘相当的精力’鼓吹一种为国效力、救亡图存的意识”^①。卜正民将其称作“事仇民族主义”，这种概括尽管未必正确，但在没有充分研究的情况下伪政权此类的主张、努力、企图是很难冠之以“骗人、没有力量、东拼西凑”等等就可以轻易摒弃的。那些用软刀子杀人的罪恶，那些试图奴化中华民族的罪恶，那些以民族主义之名屈身事仇的罪恶，如何能以笼统的文化侵略、奴化教育就轻轻放过？要知道，不是怒骂就能告别这段历史，不是唾弃就能否定这些主张。更为重要的是，只有深刻地体认他们的国家建构的主张以及行为，才能更清晰地认清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① [加] 卜正民：《中国日占区的事仇民族主义》，见[加] 卜正民、施恩德编《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陈城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第185页。